

博导文丛

新闻史的奇情壮彩

方汉奇 著



华文出版社

新闻史的奇情壮彩

方汉奇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史的奇情壮彩/方汉奇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0.3

(博导文丛/龚策主编)

ISBN 7-5075-0933-8

I. 新… II. 方… III. 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G21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055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bs.com

电话 (010) 83086853 (010) 8308666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5 印张 290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23.50 元

2BAA56/13

前 言

新闻传播学诞生于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本世纪初被引进到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和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信息科学和文史哲等众多人文科学相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中国,第一本新闻传播学专著问世于五四运动前夕。从那时到现在,不过 80 年光景,新闻传播学就已经由幼苗成长为大树。改革开放以来的这 20 年,发展得尤为迅猛。随着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电子网络等各种新闻传播媒体的深入千家万户,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历年出版的各种新闻传播学专著,累计已接近 1000 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1998 年制定的新的学科目录中,新闻传播学已由原来的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的一门显学。

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数情况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是从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开始的。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的第一本新闻传播学的书——1917 年出版的姚公鹤写的《上海报纸小史》,就是一本有关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著,其出版的时间,早于 1918 年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后者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方面的开山之作。在此后的 80 年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在

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始终占有较大比重,并且涌现过像 1927 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这样有世界影响的鸿篇巨制。新闻传播学理论的研究,必须以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论从史出。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以史为鉴,继承和发扬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好的传统,寻绎其发展规律,进而推动整个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笔者从 50 年代初起,就从事新闻传播史的教学研究工作。除了编写教材和参与几部和新闻传播史有关的《简史》《通史》及《编年史》的编撰工作外,也写过一些和中国新闻传播史有关的文章。收入本书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希望能够引起关注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读者的兴趣,为致力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同道们,提供一点有益的借鉴。

方汉奇

1999 年 4 月 16 日于北京林园

《博导文丛》编委会

主 任：龚 策

副主任：傅承洲 张 宏

编 委：白建新 穆昭天 高 飞
张星伟 严 平 杨少君



方汉奇 1926年生，广东普宁人。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同年任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员。1953~1958年、1972~197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1972年、1978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和北京市优秀教师。

主要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报史与报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等。

权威论坛 传世之作

ISBN 7-5075-0933-8



9 787507 509335 >

责任编辑：李 庆

封面设计：科亚华

ISBN 7-5075-0933-8

G·197 定价：23.50元

目 录

前 言	(1)
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 看中国古代的报纸	(1)
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	(29)
清代北京的民间报房与京报	(63)
中国封建社会言论出版禁令考	(78)
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	(95)
清末的《京话日报》	(113)
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	(127)
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报业	(158)
鲁迅的报刊活动和他的办报思想	(181)
邵飘萍是共产党员	(219)
一代报人成舍我	(232)
七十年来的中国新闻教育	(257)
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301)
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与建议	(322)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337)
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 ——记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六年来的新闻史 研究工作	(352)

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

——写在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之际…………… (370)

报史札记(四则)

印象最深的一次学术研讨会…………… (376)

爱国报人彭翼仲…………… (379)

在大英图书馆看报…………… (382)

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385)

附 录 方汉奇:厚积薄发五十载 …………… 石洪涛(389)

后 记…………… (393)

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 “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

前不久,根据已故向达教授提供的线索,在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孙文芳同志的协助下,我高兴地得到了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的抄件。这是孙文芳同志应我的请求,亲自到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根据该馆所藏原件誊录过来的。唐归义军“进奏院状”是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本世纪初从敦煌石窟窃走的珍贵文物之一。

这份“进奏院状”发报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即公元 887 年,距今约 1100 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了。对这份报纸进行过细的研究,无疑地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报纸的了解。

下面准备先介绍一下这份“进奏院状”的原文,对它的文字作一些疏证,然后再就它和中国古代报纸有关的一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引起报刊史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兴趣,也希望能够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一)

这份“进奏院状”是向达教授 30 年代在英国求学时,在当时的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先发现的,是该院所藏斯坦因从我国窃去的 7000 件敦煌卷子中的一件。据他介绍,这份“进奏院状”“存 60 行,纸背为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 64 行”(见《唐代长安

与西域文明》205页)。孙文芳同志这次代我查看了原件,证实了向达的介绍,并在给我的信中作了以下的补充:“原件是一张长97公分、宽28.5公分的横条卷,纸张是白色的宣纸,比较坚韧,文字是自右至左上下书写的,字写得相当不错。仅存60行,后一部分已佚。”看来,原件如果完整的保存下来的话,至少应在两页以上。

由于年代久远,这份“进奏院状”所报道的人、事和历史背景已经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加以“状”的作者使用了不少当时当地流行的俗体字、简化字、异体字和方言字(还可能有些错别字),读起来很有点佶屈聱牙。为方便阅览计,我尝试着作了一些疏证,但仍有不少句子索解为难。原文无标点,我试着作了一些标点。其中有一些段落因为断不了句,只好囫圇地放在那儿,以待高明。断错了的,也希望得到指正。

请先看它的原文:

(为了和后面的疏证对看方便计,保留了原文的行款,每行的前面都加了一个编号。文中的“□”,代表原件破损和看不清楚的字,是孙文芳同志抄录时加上去的)。

(第一行)进奏院 状上

(第二行)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逐件具录如后:

(第三行)右伏自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专使衙宗闰盈、高

(第四行)再盛、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

(第五行)驾前。十八日使 进奏。十九日 对。廿日参见

四

(第六行)宰相、两军容及长官,兼送状启信物。其日面见

(第七行)军容、长官、宰相之时,张文彻、高再盛、史文信、宋闰盈、

(第八行)李伯盈同行,□定宋闰盈出班,祘对叩击,具说

(第九行)本使一门拓边效顺,训袭义兵,朝朝战敌,为

(第十行)国输忠,请准旧例建节,廿余年 朝廷不以

(第十一行)指撝,今因遣闰盈等三般六十余人论节来者。

(第十二行)如此件不□获绝商量,即恐边塞难安,专使

(第十三行)实无归路。军容、宰相处分:“缘

(第十四行)驾回日近,专使但先发于凤翔,祗候侍

(第十五行)銮驾到,即与指撝者。”至廿二日,夷则以专使同行

(第十六行)发来。三月一日却到凤翔。四日 驾入。五日遇寒

(第十七行)食,至八日假开遣参 宰相、长官、军容。九日便遣

(第十八行)李伯盈修状四纸,同入中书,见宰相论节。其日,宋

(第十九行)闰盈恳苦再三说道理。却到驿内,其张文彻、王忠忠、

(第二十行)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言路次危险,不再用论节,且领

(第二十一行)取回 诏,随韩相公兵马相逐归去,平善得达

(第二十二行)沙州,岂不是好事者。其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

(第二十三行)等不肯。言:“此时不为本使恳苦论节将去,虚

(第二十四行)破 仆射心力,修文写表万遍,差人涉历沙碛,

(第二十五行)终是不了。”至十一日,又遣李伯盈修状四纸,经

(第二十六行)宰相过。至十三日,又遣李伯盈修状七纸,经四

(第二十七行)相公、两军容及长官过,兼宋闰盈口说道理。言:

(第二十八行)“留状商量”。中间三日不过文状。至十七日,又遣李伯盈

(第二十九行)修状五纸,经四 宰相过。及见 长官,亦留状,不

(第三十行)蒙 处分。中间又两日停。至廿日,又遣李伯盈修

(第三十一行)状七纸,经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过。亦宋闰盈

(第三十二行)说道理。亦言:“留状”。见数日不得指约,其张文彻、

(第三十三行)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便高声唱快。又言:“迓韩相公

(第三十四行)兵马去者,便招其□行。”官健遣一齐乱语,称:“不发

(第三十五行)待甚者!”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言:“颇耐

(第三十六行)煞人!我不得旌节,死亦不去!”夷则见他三行言语纷

(第三十七行)纭,抛却遂出驿来,又遣李伯盈修状五纸,见四

(第三十八行)宰相及长官,苦着言语,痛说理容。言:“此件不赐

(第三十九行)旌节,三般专使誓不归还者。”其□宰相、长官

依稀

(第四十行)似许。其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遂遣

(第四十一行)夷则、通彻求嘱得堂头要人一切，口称以作主
检

(第四十二行)例成持与节及官告，遂将人事数目立一文书

(第四十三行)呈过，兼设言约其日商量人事之时，三行军将

(第四十四行)官健一人不少懋言相随论节，只有张文彻、王
忠忠、

(第四十五行)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不肯，言：“终不相随。”

其张文彻

(第四十六行)就驿共宋闰盈相诤。其四人言：“仆射有甚功

(第四十七行)劳，覓他旌节？二十年以前，多少楼罗人来论
节

(第四十八行)不得，如今信这两三个憨屡生，愧沸万劫，不
到家

(第四十九行)乡，从他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诈
祖乾圣。

(第五十行)在后论节，我则亲自下卦看卜，解圣也不得旌
节。

(第五十一行)待你得节，我四人以头倒行。”夷则见张文彻
等四人

(第五十二行)非常恶口秽言，苦道不要论节，亦劝谏宋闰
盈、李伯

(第五十三行)盈等荣则同荣，辱则同辱，一般沙州受职，其

(第五十四行)张文彻、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上自
不怕

(第五十五行)仆射，不肯论节，一齐抛却发去，有何不得？

其宋闰

(第五十六行)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四人以允不肯。言:“身死

(第五十七行)闲事,九族何孤。节度使威严不怕,争得我四人?如

(第五十八行)不得节者,死亦不归者”。夷则见他四人言语苦切,同见

(第五十九行)堂头要人,仔细商量。“不用疑惑,但频过状,我与

(第六十行)成持。”至廿三日,又遣李伯盈修状四纸,经宰相(下佚)

下面再按原件的顺序,逐行对原文作一些疏证。

(第一行):“进奏院”,发报机关;“状”,公文的一种,这里专指官文报,即邸报;详下。这四个字可以连读。它的款式值得注意:一开始就标出了发报机关,表明它是由进奏院发出的官报。这里的进奏院,指的是唐归义军节度使派驻朝廷的进奏院,详下。“上”是动词,作呈递解,不是上下篇的上。

(第二行):“当道”,唐时公文的习惯用语。《通鉴》卷二五八:“朱全忠军于河阳,汴军之初围泽州也,呼李罕之日,相公每恃河东,轻绝当道”。胡注:“当道犹云本道,汴军自谓也”。在这里,“当道”主要指的是领导这个进奏院的归义军节度使。“专使”亦见于下文的第三行、第十二行和第三十九行,指的是奉本节度使派遣,到朝廷来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三般”即“三班”,可解释为三批。“旌节”详下文第十三行“建节”条。

(第三行):“伏”应作“伏”。“右伏”是当时上行公文的常用套语。“光启”,唐僖宗的年号。“光启三年”即公元887年(这一年的闰十一月十四日以后跨入888年),下距唐王朝的灭亡只有

十几二十年。这个年号是确定这份“进奏院状”发报时间的重要根据之一。从下文的内容看，它所报道的主要是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三日这一个多月时间内发生的事。本行和下一行提到的宗闰盈、高再盛、张文彻，第七行提到的史文信，第十九行提到的王忠忠，第二十行提到的范欺忠、段意意，第二十二行提到的李伯盈等，都是“三般专使”中的人物。据第十一行所记，全部“专使”共60余人，但是在“状”文里提到名字的只有这8个人，很可能是他们当中的骨干。其中，宗闰盈是“专使”们和朝廷办理交涉时的主要发言人，李伯盈是“考使”们向朝廷上报书面材料的主要执笔人。他们的事迹已无可考。大约都是所在地方的中下级军官。宗闰盈的宗，下文均作宋，这里可能是笔误。张文彻的彻，原文作“徹”。

(第四行)：“兴元”，府、路名。唐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升梁州置府。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附近。这个地方在唐僖宗时期，曾经两度充当皇帝的行在。第一次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至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当时黄巢攻占长安，僖宗被迫逃往山南，再逃成都，等到黄巢败死，才迁回长安。这一次出亡，往返都曾以兴元为行在。第二次在光启二年至三年(公元886—887年)。这一次是由于李克用的沙陀兵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兵进逼京师，威胁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挟持下，再度逃亡兴元。《通鉴》卷二五六对这次出亡的狼狈情况，有过如下的描述：“(光启)二年正月戊子，令孜请上幸兴元，上不从。是夜，令孜引兵入宫，劫上幸宝鸡，黄门卫士从者才数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朝士追乘輿者至周至，为乱兵所掠，衣装殆尽。……二月，驾至兴元。”这一次在兴元呆的时间比上一次要长，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才返回长安。这份“进奏院状”所报道的，正是唐僖宗在兴元的后期，和离开兴元返回长安途中的一些事。

(第五行):“驾”,指唐僖宗。这是晚唐时期的一个庸黯无能的皇帝。他12岁即帝位,一切政事悉听命于宦官田令孜。史称他“威令不振,朝廷自卑”。《旧唐书》卷一七七《杜审权传》记他在兴元时期的窘状,有“行帑无寸金,卫兵不宿饱,帝垂泣侧席无如之何”等语。这份“进奏院状”所报道的这段时期;他26岁,一年后,他刚刚回到长安不久,就病死了。

(第五行—第六行):“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指专使们所会见的唐王朝中枢机关的主要文武官员。宰相是“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的朝廷大员。据《新唐书》卷六十三《宰相表》,光启三年前担任宰相职务的,有孔纬、杜让能、韦昭度、张浚等四人,韦就任于中和二年,孔、杜就任于光启二年,张就任于光启三年正月。这个数目与“状”文里提到的“四宰相”的数目正合。军容是“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或“神策军观军容使”的简称,是名义上的全国军事统帅,实际上它所能控制的仅只是皇帝身边的禁卫军,即神策军。这一职务始置于唐肃宗至德中,担任这一职务的多数是宦官,鱼朝恩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个。僖宗时改以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西门匡范为右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光启二年,田令孜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活动中去职,由杨复恭继任左神策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事见《新唐书》卷二〇八《田令孜传》、《杨复恭传》。“状”文里所说的“两军容”,指的就是杨和西门这两个人。“长官”是对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各部门主管官员的泛指,它可能指枢密使,也可能指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和各部尚书一类的品级较高的官员,因为没有写出姓名,已经难以确指了。唐季藩镇跋扈,他们派出的代表往往可以人见天子,归义军的实力较小,不足以左右朝廷,但他们的“专使”还是一来就得到了唐天子的接见,而且始终在和宰相、军容、长官这些朝廷高级官员打交道,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藩镇气势